

理解印刷文化史： 關鍵詞的形式與交互的方法 ——兼談《紙還有未來嗎？》的啟示*

楊石華**

書名：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

作者：組論小組

譯者：傅力

出版日期：2021年3月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摘要

《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以關鍵詞的形式和交互的方法為讀者提供了一份關於 18、19 世紀的西方印刷文化史知識地圖。「組論小組」基於交互概念的創新視角與方法對 18 個關鍵詞進行了細緻地研究，向讀者揭示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印刷交互實踐。該書對中國印刷文化史研究者的啟示是，研究者需要重視印刷實踐中作為交互基礎的物質性、聚焦微觀視角下的本土印刷交互實踐、關注印刷域中的媒介化配置。

關鍵詞：交互性、印刷文化、物質性、書寫方式、媒介化配置

* 本文十分感謝匿名評審委員和編輯部關於修改的寶貴意見以及編輯的校編付出。

**楊石華為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講師，Email: gushiqi@sina.cn。

投稿日期：2022年7月10日；通過日期：2022年10月5日

在數位媒介時代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視角去理解印刷時代中的印刷文化，又應該以何種方式去勾勒其知識圖景？這些問題是印刷文化史研究者所要思考的。《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向我們展示了關鍵詞的形式和交互（interacting）的方法是一種可實現的有效路徑，並對當下中國的印刷文化史研究有著較好的啟示。

壹、關鍵詞：知識圖景建構的書寫方式

新世紀之後以關鍵詞為題名和形式的著作在出版界逐漸興盛起來。這些關鍵詞類著作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單個關鍵詞的深入研究性專著和通俗讀物。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的《意識形態》等「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另一類則是某一領域或學科體系中的關鍵詞集合性著作和通俗讀物。如江蘇人民出版社策劃出版的《政治哲學關鍵詞》等「關鍵詞叢書」和麥田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德國文化關鍵詞：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法國製造：法國文化關鍵詞100》、《製造中國：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等。

正如汪民安（2007，頁2）所強調的「關鍵詞和概念的發明，是理論對世界進行表述的權宜之計。晦澀的世界，必須借助詞語通道隱約地現身。理論家將某些詞語和概念召喚而來，就是為了利用它們，盡可能地照亮世界的晦暗秘密。」這些關鍵詞叢書的出版和受到讀者熱捧，反映了研究者們正在開始重視以概念／術語作為線索去勾勒某一具體研究對象、領域以及學科體系，進而探索更為廣闊的隱秘世界。學界用關鍵詞或概念術語去探索某一領域或學科知識地圖的實踐主體之一是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它們有意識地開展基礎性的概念或理論術語研究，從而推進學科體系建設。在新聞傳播學領域中《新聞與傳播研究》開設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專欄」，並集結出版了《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規範化研究》。除學術期刊外，研究者自發組織策劃和編撰的關鍵詞著作或叢書，同樣是一種致力於用詞語和術語來建構學科知識地圖的實踐方式，如陳力丹和易正林編的《傳播學關鍵詞》、胡翼青主編的《西方傳播學術史手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成果在其內部的思想交互相對較少，集結成書之後在思想的整體效果方面並沒有達成「整體總是大於各部分的總和」（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9）的效

果。

這一問題普遍地存在於所有以關鍵詞形式來書寫某一領域知識地圖的著作中（主要是關鍵詞集合類著作）。因此這一問題正成為繼「分科治學模式導致對研究物件的切割」、「詞典釋義模式導致關鍵詞闡釋的非語境化」、「經義至上模式導致對關鍵詞之現代價值的遮蔽」的關鍵詞研究困境之後又一個須給予重視的問題（李建中、胡紅梅，2014）。那麼我們如何在關鍵詞的形式下，保障各關鍵詞間的科學脈絡連繫和各書寫者間的思想互動，從而形成思想合力呢？《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為這一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與書寫範例。

不同於雷蒙·威廉斯（Williams, 1976／劉建基譯，2005，頁 6）作為「對於一種詞匯質疑探詢的記錄」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紙還有未來嗎？》是一部關於西方印刷文化史這一特殊領域的術語匯編，但它在書寫過程中兼具了探索各關鍵詞間的相關性與互動性。該書選擇了「紙張」、「廣告」、「雕版」、「卷首畫」、「編目」、「索引」、「裝幀」、「易逝」、「氾濫」、「干擾」、「會話」、「選集」、「書信」、「手稿」、「標記」、「空白」、「舞台」、「增厚」18 個關鍵詞，來向讀者提供了一份關於西方 18、19 世紀印刷文化史的知識地圖，這些關鍵詞涵蓋了印刷實踐中的管理技術（「編目」、「索引」）、屬性特徵（「易逝」）、社會影響（「干擾」、「氾濫」）等各個方面。同時這些印刷關鍵詞之間彼此糾纏，有助於將西方印刷文化知識進行關聯，從而形成一個整體的知識圖景，這也賦予了「關鍵詞」這種書寫方式具有明顯的系統化歸納優勢。

貳、交互：內容書寫與知識生產的方法創新

「交互」是《紙還有未來嗎？》一書中最重要的創新點，它既是書寫印刷文化史的理論基礎，也是具體的知識生產方式。「交互性」是一種「用於分析人與人之間、人與機器之間以及機器與機器之間交互的廣義概念」（Gane & Beer, 2008／劉君、周競男譯，2015，頁 96）。它涉及對內容的控制和受眾的反饋兩個方面（King, 1998）。《紙還有未來嗎？》一書中的「交互性」主要偏向於「內容控制」。因為處於「控制」層次的交互性，讀者可以自己賦予內容以含義並控

制整個交互體驗（Alsop, 1995, August 7）。

一、交互性視角下的內容書寫

「組論小組」在對西方 18、19 世紀的印刷實踐展開研究時，以「交互」作為基礎將其內容分為人與印刷品的交互、印刷品與非印刷品的交互及印刷品中介下的人際交互三種。

人與印刷品的交互是印刷文化史最常見的實踐方式，因為印刷品作為資訊傳播工具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產品，是文化消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僅就書籍這一印刷品類型而言，出版商可以通過與文本的交互，以「選集」的形式來實現文本再生產，從而達成再造經典的意圖；同時也可以通過將自己的產品與其他產品進行區分，達成排除和劃定受眾的「廣告」，這一交互實踐實現了宣傳行銷的目的。在讀者方面，人與印刷品的交互實踐更為多元化，人們不僅可以在出版商特意留下的「空白」處進行反映自身閱讀體驗的「標記」；以折疊、剪切和黏貼的方式來對「紙張」進行交互；也可以通過「增厚」的交互實踐在既有文本的基礎上添加諸多自己感興趣的新文本或素材；還可以依據自身的審美偏好和品味對書籍進行「裝幀」。人與印刷品的多元化對話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印刷品自身具有一定的「能供性」（*affordance*），但這種「能供性」並非是封閉的，反而是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開放性和可塑性。作為物的印刷品，它的資訊傳播特性為出版者和讀者搭建了溝通的橋樑，更為讀者的資訊需求提供了客體物件，因此這種「能供性」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和應用。

印刷品與非印刷品的交互是媒介生態中的一種混合組合實踐方式。在這種交互實踐中，印刷品與非印刷品間並不是一種對立衝突或相互替代的線性發展邏輯，而是一種整合發展的進化發展邏輯。正如，「手稿」、「書信」以及沙龍中的「會話」並沒有被印刷品所替代，他們之間反而呈現出一種「適應性、抵抗性和融合性」的發展狀態（*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215），並在整合發展中以競爭的方式創造出來新的社會交往或文化實踐。「卷首畫」作為一種視覺圖像，在與印刷文本交互時，它「提升了作者的地位，起到了一種間接的『解讀門檻』的作用，塑造了讀者閱讀這本書的方式」（*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165）。與視覺圖像密切相關的另一種交互技術是「雕版」，「基於

雕版的複製品影響了觀眾參與視覺藝術的方式。書籍中的圖片改變了人們對富有想像力的文本和科學文本的處理方式，參觀畫廊或印刷品商店使人們進入了由印刷構成的社會空間」（同上引，頁 132）。這些印刷品與非印刷品的交互實踐及其結果駁斥了印刷文化中關於「印刷取代了其他媒介」的謬見。

印刷品作為一種資訊傳播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發揮著中介化的作用。這種中介化的功能促使它能夠連接作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並在其中發生各種交互實踐，即「印刷不僅製造了一種大多數讀者永遠不會當面見到作者的關係，它還能在讀者之間的關係中真實地產生影響」（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14）。在由印刷品所連結並發展起來的讀者社群中，交互實踐通常會催生出各種社會變革。印刷術的興起所帶來的資訊傳播及其固化作用使得人們可以跨越時空共用某種理念和主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主義的發展。這正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強調的印刷術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在討論印刷文化中人與人的交互時，批判性地反駁了「印刷文化代表了民族文化」的謬見。這反映出的是研究者們對印刷品的強效果論持保守態度，並且更多關注的是中觀或微觀層面的交互實踐與影響，即「人們是如何利用印刷品來組織和協調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的？」（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13）。

綜上可見，這種分類具有一定新意並且基本涵括了印刷實踐中的各種交互行為。如果說人與印刷品的交互實踐和以印刷品為中介下的人際交互實踐，是較為常見和易於被觀測到的交互類型，那麼該書所強調的印刷品與非印刷品間的交互實踐則十分容易被忽視。因為在線性的媒介進化論思維下，大多數人會被印刷媒介取代其他媒介又會被其他新媒介取代的主張迷惑，而忽視了他們之間的競爭、抵抗、整合發展的動態博弈狀況。而這種動態的交互實踐使得印刷品的能供性更強，也決定了印刷文化蘊含著更多的複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所選擇的 18 個關鍵詞分屬於不同類別的交互實踐中，但他們並非只能附屬於其中的某一類。在以關鍵詞的形式來展開論述 18、19 世紀的西方印刷文化史時，「組論小組」以「交互性」的問題意識出發，針對特定關鍵詞涉及到的具體交互實踐來展開

學術敘事，而非僅是一種關於印刷知識的簡單介紹。例如，在「編目」這一關鍵詞中，研究者們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是：

我們想知道的是，不僅在 18 和 19 世紀，在更廣闊的時空裡，編目是如何參與塑造個人之間的關係的？編目以何種方式展現了這個世界？編目是如何嵌入特定閱讀文化中的？編目中以線性印刷排版所呈現的那種具有參考性和索引性的內容是如何影響了非典型的閱讀模式？（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77-78）

並在這一系列問題中，他們深入地剖析了「編目」的固定和解除功能，將其視為是一種整合了其他元素的印刷載體擁有著豐富的潛力，並對人與編目交互實踐中所形成怪異閱讀，即「一種由編目中零碎的語法所引起的聯想式的略讀形式」（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90）展開了分析，進而提出了「編目仿佛是一種哥特式的閱讀體驗，它允許讀者進入一個幻想的領域，在那裡，寂靜的物體變得栩栩如生，而事物並不是他們曾目睹時的模樣」（同上引，頁 92）的精彩觀點。這種學術敘事的方式頗具洞見和啟發性，它向讀者展示了遮蔽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層次印刷文化。

二、交互性視角下的協作式知識生產

在該書中研究者們不僅在內容層面借助了交互的視角，他們還將其轉變為一種協作式的知識生產。因此他們以「組論小組」自居，通過線上的即時通訊技術和身體在場的線下會議研討方式進行了人際間的思想交互。這 18 個關鍵詞並非是被孤立地被分配到哪一位研究者手中，而是在所有研究者共同協商下完成了每一個關鍵詞的寫作，因此每位研究者都對所有內容負有相同的責任。這種思想的交互書寫方式使得該著作獨具創新性，有別於其他的關鍵詞研究。

過往的關鍵詞著作雖然也都在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但事實上它們大多都存在顧此失彼的問題。它們或是在形式上以關鍵詞進行串聯而在內容深度上有所欠缺，或是在內容上圍繞著關鍵詞進行展開而對形式有所忽視。在實際操作方面，它們主要以個體研究者領取自身感興趣或拿手的關鍵詞展開獨立的寫作，後續拼貼在一起，從而形成

某一領域或學科的關鍵詞研究文集。在關於政治學關鍵詞研究的《理解中國政治：關鍵詞的方法》一書中就提到「雖然本書的目標是以關鍵詞的形式來呈現經驗事實，但實際的操作過程並沒有設計的那樣理想。以統一的詞條格式來要求作者撰寫，事實上有一定的困難」（景躍進、張小勁、餘遜達，2012，頁3），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處於動態變化和政治學研究也處於發展階段，因此「尊重作者的選擇權，由他們按照自身的方式來發揮，畢竟內容重於形式」（同上引）。由此可見，這種寫作方式算是一種思想集合，但沒有實現深層次的思想交互，故而在整體中仍存在各種疏離、矛盾、局限。

基於跨學科和跨國別的「組論小組」在切實地踐行著思想「交互」的方法論，研究者們在「播種」——「嫁接」——「壓制」的交互協作中對印刷實踐關鍵詞展開了協同式的知識生產，並最終在不斷的碰撞和爭鳴中「解決規模和一致性的雙重問題，它匯集了廣泛的學者，結合了編著的多面性和專著的統一視野，以這樣一種方式使工作綜合化而不是分化」（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8）。因此在18個關鍵詞的學術敘事中他們都遵守著相同的思維邏輯和書寫方式，雖然也有個別關鍵詞與其他關鍵詞在內容結構方面有著一定的差異，但那更多的是由關鍵詞自身的發展歷史和內容要素的獨特性所導致的。在這種「組論」式的協同知識生產方式下，同一研究問題的各種思想得到了有效地交互，並被整合成了一種突破個體知識盲區和思維局限的更高層次的知識創新。

參、對中國印刷文化史研究的啟示

該書雖然是一部關於西方18、19世紀的印刷文化史研究著作，但它的關鍵詞形式和交互視角以及背後所蘊含的議題都對中國印刷文化史研究有著重要啟示。

一、重視印刷實踐中作為交互基礎的物質性

印刷文化的基礎是紙張與複製技術的發明普及，這也決定了印刷文化具有深厚的物質性特徵。這種物質性特徵在該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凸顯，在18個關鍵詞或概念的論述中，大多數都是以印刷文化的物質性為基礎來展開的。因此在印刷文化研究中討論人與紙的交互實踐時，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物質性這一前置基礎。近年來物質性轉向在

各學術領域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電子媒介尚未興盛之前，印刷品作為主要的資訊傳播媒介，其物理形態特性在傳播活動中得到了直觀的表徵。例如，文本紙張的物質性存在決定了人與之交互存在折疊、剪切和黏貼三種不同的實踐方式（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257）。

在資訊傳播和知識傳遞的過程中，資訊存儲是傳播擴散的前提。以紙張為中心的印刷媒介因其物質性，為人與印刷品的交互提供了很好的書寫平台。這一平台改良了人與物之間傳統的銘刻交互實踐，它借助印刷術的技術賦權實現了規模化刻寫，提升了資訊知識的存儲能力。印刷時代的這種傳播物質性決定了以紙張為中心的印刷媒介是一種「銘刻媒介」，因此在人與印刷品的各種交互實踐過程中主要是通過「刻寫實踐」的方式實現了資訊知識的存儲化和記憶化。「刻寫實踐」是相較於「體化實踐」的一種能夠「說明記憶如何在身體中積澱或積累」（Connerton, 1989／納日碧力戈譯，2000，頁 90）的行為，「我們通常把刻寫當作傳遞社會記憶的特許形式，我們認為社會刻寫體系的傳播和周密化，有可能讓它的記憶能力得到有說明意義的發展」（同上引，頁 125）。由此可見，傳播的物質性能夠為社會記憶的形塑與延續提供基礎保障，從而為人與印刷品的交互賦予更多的文化意義。

關注印刷文化中的物質性是由印刷自身特性決定的，對它的關注有助於豐富當下的傳播物質性研究基礎。目前傳播學領域中的物質性轉向似乎過於迅猛，相較於熟悉的報刊書籍等印刷品，研究者們更熱衷於電子媒介和以互聯網為依託的諸多新興媒介，以至於電子媒介時代之前的印刷媒介中的物質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這種忽視反映出的是一種假想的物質性前提共識，但這種假想卻未被深入地去驗證，從而使得傳播的物質性在基礎性研究領域相對薄弱。《紙還有未來嗎？》在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它從「交互」概念出發，既深化了印刷文化史研究，也豐富了傳播的物質性基礎研究，從而為當下的印刷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典範。

二、聚焦微觀視角下的本土印刷交互實踐

印刷品的強大社會整合功能被反覆提及，尤其是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中論證了印刷術在

「想像的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後。這也促使了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大多沿襲著這一典範在不斷演進。目前的中國印刷文化史研究中並沒有專門以交互性為視角的專著，且其研究視野大多偏向於宏觀。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印製史》等「中國印刷史叢書」和《清代四堡書坊刻書》等「福建印刷文化研究叢書」以及《中國印刷史話》（張紹勛著）和《中國印刷史：從手抄到活字，知識不再是貴族的專利》（谷舟主編）等同樣也沒有從微觀「交互」的視角去對印刷實踐展開專門的研究。

事實上，在印刷的宏觀社會整合功能思維之外，我們可以適當地從微觀層面去重新審視其中文化實踐，即再審視「組論小組」所強調的在印刷文化史研究中需要去關注禮品書、兒童讀物、文學、翻譯等交互形式（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6）。例如，在近代中文報紙印刷出版後的閱讀環節中存在的剪報行為，就是一種人對紙張進行「剪切和黏貼」的互動過程，與此同時它還涉及到「增厚」。另外，在考察作為政治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時，作為「卷首畫」的領袖肖像功能並沒有被深入地討論。然而相較於文字內容，在閱讀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這些革命領袖的肖像畫則是最先進入讀者視覺系統的，它們不僅承擔著建構讀者與經典著作的交互期望，更賦予了作者聲望，為其建構視覺文化資本。

此外，作為特殊印刷品的「掛曆」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情境中，充分發揮著「禮品」的功能，這種特殊的「禮品」所蘊含的則是傳統的「關係」。在關係學者楊美惠的專著《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一書中，她就專門提到了1984年北京某印刷廠所印製的掛曆在人情世故和社會關係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她這樣寫道：

那一年，廠裡印了 5000 冊美女時裝的彩色掛曆。給廠裡的每位工人發年終紀念品發出了 300 本，其他 3000 本以每本 4.2 元的價格賣掉了，利潤歸工廠。剩下的 1700 本分給了工廠各部門的主管和車間主任，讓他們給廠外關係戶送禮。（Yang, M. M., 1994／趙旭東、孫珉譯，2009，頁93）

這些掛曆的送禮對象包括與印刷廠有長期業務往來的大印刷公司、提供紙墨和印刷鉛條的企業、市供電局以及與工廠有各種關係的朋友。掛曆這一印刷品的「禮物」屬性及其在人際交往中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也引起了國家出版管理機構的重視，為此國務院辦公廳（1981年10月5日）就曾專門發文做出了規定：「各單位為辦公室配備的日曆，應本著節約的精神，嚴格控制購買。任何單位都不得購買掛曆送『關係戶』或個人。」

當我們從交互的視角重新審視「剪報」、「革命領袖卷首畫」以及作為禮品的「掛曆」這些本土化的微觀而具體的印刷交互實踐時，它將極大地拓展中國印刷文化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並有可能提供能夠與西方印刷文化史研究進行對話的研究典範。

三、關注印刷域中的媒介化配置

該書以「交互」作為研究視角對西方 18、19 世紀的印刷文化史展開了論述。在具體的研究中，研究者們採用了 18 個關鍵詞並以社會網絡分析的方式探討了其中的關聯式結構，從而創造性地提出了「基於反致系統的網絡」（側重與作者對文本的整體理解和以印刷實踐為中心）和「基於主題相似性的網絡」（側重與潛在的主題和共同關注點，以抽象概念為中心，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352-354）。從傳播研究者的視角再探討這些關鍵詞時，媒介學中德布雷的「媒介域」是一個頗具對話性的理論。因為它們之間在理念主張方面有著諸多的相似性，例如在「媒介域」理論中，「每一次發生的媒介技術革命並不一定在物質形式上消除以前的媒介文本，而只不過是讓先前的媒介文本所承載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功能有所改變」（陳衛星，2015，頁 10），這一觀點就與該書所主張的，在媒介生態中印刷媒介與非印刷媒介間的交互實踐主要呈現出整合發展特性是相契合的。

在德布雷的理論體系中，「媒介域」是「以資訊傳播的媒介化配置（包括技術平台、時空組合、遊戲規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會制度和政治權力的一個文明史分期」，以此為依據可以將人類文明史被劃分為：文字（邏各斯域）、印刷（書寫域）和視聽（圖像域，陳衛星，2015）。對照三個不同的媒介域分期，18、19 世紀的印刷文化時代屬於是典型的印刷域。在媒介域的概念中關於技術平台、時空組合

以及遊戲規制等媒介化配置因素，對重新考察印刷文化史中的交互實踐有著較好的啟發性，至少它提供了不同於用交互類型來歸類這些關鍵詞的另一種分析框架。

（一）印刷實踐中的技術平台

在印刷交互實踐中涉及到各種管理技術的運用，「紙張」、「雕版」、「編目」、「索引」、「空白」、「增厚」、「手稿」、「標記」這些關鍵詞都屬於這一類媒介化配置。作為印刷術基礎設施的紙張是印刷文化中的基礎性技術平台，它為各種「刻寫」實踐提供了運行基礎。作為示範性導引工具的「索引」和作為期待導向的「編目」也都可以被視為是印刷實踐中用於管理交互關係的技術裝置。另外，「雕版」「對創造和傳播國家特性至關重要」（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131），尤其是在維也納、倫敦、巴黎這樣的國際化都市中雕版印刷深深地嵌入到了社會結構之中，並直接作用於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在這些技術平台中，他們的工具性和作為中介的平台性得到了充分體現。工具屬性使得他們的能供性得以提升，並能夠有效地達成出版者、作者以及讀者各方面的需求預期，進而能夠作為一種中介為各方利益相關者提供開放性的交互平台，從而為其各種對話模式奠定了物質性基礎。

（二）印刷實踐中的時空組合

在人與紙的交互中，作為中介的印刷品借助其資訊存儲能力能夠打破時空的限制，重新建構新的社會關係甚至推動社會結構的大變革。在該書所討論的「舞台」、「會話」、「書信」等關鍵詞都具有調節時空關係潛力。作為身體在場的戲劇表演需要空間性的舞台作為媒介載體，從而為觀眾們提供社交空間。劇本的印刷出版則為「表演的短暫性與印刷品的永久性」（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314）提供了對話的交互實踐，同時它還具備提供精神戲劇的歷史功能，即它將一些從未真正演出過的戲劇，以印刷品／劇本作為「舞台」為讀者／觀眾呈現一出出精神戲劇，從而調整了身體在場的戲劇表演所需的空間舞台。另外，書信作為一種古老的通訊工具，它能突破時空的限制將所銘刻的資訊進行保存並借助某種工具（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某種技術）進行傳遞並達到相互溝通的效果。這

資訊溝通方式具有很強的私密性，但隨著觀念的轉變，在某些特定的社群中「書信」逐漸成為一種建設和維護社區的重要工具，因此通常會被視為是一種「群體財產」從而被集體閱讀和傳遞（同上引，頁198）。這也推動了書信集的出版實踐得以興盛。這種書信集的印刷品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特定資訊的一對一傳播方式，而是將其轉變為一種大眾傳播行為，將其內容的傳播範圍變得更廣，而這很可能會帶來某些具有不確定性的社會變化發生。僅就學術研究而言，這些書信交往中的內容則為當下的歷史研究帶來了新的研究素材，成為歷史真相還原的新方式。

（三）印刷實踐中的遊戲規則

在印刷時代中，資訊存儲與複製技術在嵌入到社會結構變革時會形成各種遊戲規制從而形塑整體的文化形態。在這些遊戲規制中有兩組相近的關係是需要印刷文化史研究者特別注意的。

一是，整合與分化。在印刷實踐的交互中，作為中介的印刷品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既能夠將作者與讀者進行連結對話，也能將不同的讀者進行連結形成共用同一種思想的群體，從而實現社會整合的傳播效果。除了整合功能外，人與紙的交互實踐中還存在一種分化規則，而這正是該書在印刷文化史研究中所要強調的一個潛在思想。「廣告」以排除和劃定特定的人群作為實現傳播效果的特定策略，其本質是一種分化思想來實現傳播目的（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33）。18、19世紀的「裝幀」雖然被視為是一種個性化表達，但「這種實踐會被動員起來，以個性化的幌子創建社會的層次結構，將書籍按類分組，並將人分成不同的讀者群」（同上引，頁75）。因此它也是一種分化規則的體現。印刷域中的這種整合與分化的辯證關係在視聽域或互聯網時代中並未消失，而是以連接與反連接／斷開的新辯證關係得到延續（彭蘭，2019）。

二是，強化與消解。在印刷實踐的各種交互中，諸如「選集」、「卷首畫」此類的印刷實踐能通過「經典化的過程來調節人們的文學品位，隨時間的推移來保存精選作品」（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41）和為作者賦予聲望，「為浪漫主義文學的自我表達提供物質支持和文化資本」（同上引，頁166），從而對作者及其文本的權威性起到強化作用。印刷實踐除了起到強化作用

外，它還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為此該書專門探討了諸如「干擾」、「氾濫」、「易逝」等現象。這些現象同樣屬於印刷文化中的副產品，雖然它們的功能飽受爭議，但也真實地反映出了印刷實踐中人與紙交互的多元複雜性。

肆、結語

作為一部經由「組論小組」進行思想交互協作而成的著作，《紙還有未來嗎？》通過 18 個關鍵詞的書寫為我們勾勒出了西方 18、19 世紀的印刷文化史概況。首先，「組論小組」向讀者展示了在印刷業高度飽和的時代中「交互性」是印刷文化的關鍵詞，人與印刷品、印刷品與其他媒介、印刷品連結下的人與人間的交互共同建構了複雜的印刷文化。其次，「組論小組」通過視覺化的方式對 18 個印刷文化關鍵詞進行了社會網絡分析，為讀者呈現了印刷文化內部各構成要素間的網絡結構關係，其中從研究者視角來看「裝幀」和「增厚」處於印刷文化網絡結構的核心位置，從印刷文化主題視角來看「干擾」、「氾濫」、「易逝」等則處於結構網絡中的中心地位（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傅力譯，2021，頁 352-355）。最後，「組論小組」通過關鍵詞的書寫方式向研究者提出了一個「用於描述一種特定形態與歷史上特定的實踐相關聯如何產生新的社會形態」和強調不同媒介間交互協作的「媒介—社群—實踐」三角理論（同上引，頁 16）。

《紙還有未來嗎？》的核心價值在於創造性地運用交互性的理論視角對西方印刷文化史進行深入分析。將「交互性」引入印刷文化史研究中，有助於我們綜合性地討論個體讀者的閱讀體驗、印刷品社會場域中的媒介生態環境以及印刷品的社會整合意義，從而實現印刷文化的意義增值；這種從交互性視域來審視印刷文化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指示」意義，即在作為對內容進行控制的交互性框架下來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 18、19 世紀西方的印刷文化史脈絡（楊石華、陶盎然，2022）。

近年來隨著老一輩學人的逝去，學界在緬懷大師逝去的同時也在擔憂後繼無人和知識生產的品質，尤其是在史學研究領域。作為將「交互性」這一主題思想在內容與形式上實現創造性整合的典型案例，《紙還有未來嗎？》除了為印刷文化史研究帶來交互性的視角

外，它還為學術研究的知識生產帶來了交互式協作的創新型知識生產方式且具有較好的推廣價值。雖然這種交互式協作的知識生產在既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尚處於探索階段，但只要這一理念在學術共同體中得以擴散，必將對學術界的知識生產產生巨大的變革性作用，從而解決「資訊過剩」和緩解大師逝去的知識生產品質焦慮，切實提升學術知識生產的品質。

參考書目

- 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印製史編委會編（2014）。《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印製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
- 汪民安（2007）。〈前言：詞語的深淵〉，汪民安編《文化研究關鍵詞》，頁 1-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汪民安（2013）。《文化研究關鍵詞》。臺北：麥田。
- 李建中、胡紅梅（2014）。〈關鍵詞研究：困境與出路〉，《長江學術》，2：66-72。
- 吳錫德（2010）。《法國製造：法國文化關鍵詞 100》。臺北：麥田。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吳世燈（2021）。《清代四堡書坊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谷舟編（2021）。《中國印刷史：從手抄到活字，知識不再是貴族的專利》。臺北：崧燁文化。
- 季廣茂（2005）。《意識形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林添貴譯（2021）。《製造中國：近代中國如何煉成的九個關鍵詞》。臺北：麥田。（原書 Hayton, B. [2020]. *The Invention of China*. London, 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 胡翼青、吳越、李耕耘編（2015）。《西方傳播學術史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納日碧力戈譯（2000）。《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Connerton, P.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陳力丹、易正林編（2009）。《傳播學關鍵詞》。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衛星（2015）。〈傳播與媒介域：另一種歷史闡釋〉，《全球傳媒學刊》，2(1)：1-21。
- 唐緒軍、王怡紅、宋小衛編（2019）。《新聞學與傳播學名詞規範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

- 國務院辦公廳（1981年10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堅決剷住國內互贈掛曆不正之風的緊急通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編《出版工作文件選編（1981-1983.12）》，頁71-72。北京：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辦公室。
- 張紹勛（1996）。《中國印刷史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張鳳陽等（2006）。《政治哲學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莊仲黎譯（2017）《德國文化關鍵詞：從德意志到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臺北：麥田。（原書 Dorn, T. & Wagner, R. [2011]. *Die deutsche Seele*. Munich, DE: Albrecht Knaus Verlag.）
- 景躍進、張小勁、餘遜達（2012）。〈編者說明〉，景躍進、張小勁、餘遜達編《理解中國政治：關鍵詞的方法》，頁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彭蘭（2019）。〈連接與反連接：互聯網法則的搖擺〉，《國際新聞界》，41(2)：20-37。
- 傅力譯（2021）。《紙還有未來嗎？：一部印刷文化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原書 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2018]. *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楊石華、陶盎然（2022）。〈《紙還有未來嗎？》：交互性視域下的印刷文化史研究〉，《中國圖書評論》，1：86-92。
- 趙旭東、孫珉譯（2009）。《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 Yang, M. M. [1994].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劉建基譯（2005）。〈導言〉，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頁1-21。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原書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劉君、周競男譯（2015）。《新媒介：關鍵概念》。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原書 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Oxford, UK: Berg.）
- Alsop, S. (1995, August 7). Real choice, not just more work: That's what makes the web truly interactive. *InfoWorld*, 82.

King, E. (1998). Redefining relationships: Interactivity between new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4(4), 26-32.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Printing Through Keywords and Interactive Methods: *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

Shi-Hua Yang*

Abstract

Interacting with Print: Elements of Reading in the Era of Print Saturation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knowledge map of Western printing culture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rough keywords and interactive methods. The Multigraph Collective presents a detailed study of 18 keywords, revea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rinted matt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inted matter and nonprinted matter,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n printed matter. The book suggests that researchers who study Chinese printing cultur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ateriality as the basis of interaction in printing practice, focus on the interactive practice in local printing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dia configuration in the media spheres of printing.

Keywords: interactivity, printing culture, materiality, writing style, media configuration

* Shi-Hua Yang is Lecturer at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Email: gushiqi@sina.cn.